

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

真谛的《转识论》

[美] 蒂安娜·保尔 著

秦瑜 庞玮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

真谛的《转识论》

[美] 蒂安娜·保尔 著
秦瑜 庞玮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真谛的《转识论》/(美)蒂安娜·保尔著;秦瑜,庞玮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9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978-7-5325-5950-3

I. ①中… II. ①保…②秦…③庞… III. ①唯识宗—佛学史—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①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5170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颢

觉群佛学译丛

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

——真谛的《转识论》

[美]蒂安娜·保尔 著

秦瑜 庞玮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0 $\frac{6}{18}$ 插页 5 字数 195,000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ISBN 978-7-5325-5950-3

B·733 定价:3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1984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版权所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和出版。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 19 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 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



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以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参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2004年8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致 谢

我要向所有促成此书最终完成的同事致谢。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在日本的同事，他们不仅影响了我个人的工作，且还不断在为他人已拟定的真谛研究提供思想资源。诸君时下正致力于完成各自有关真谛的研究著作，而我有幸在日本时得与诸君相询讨教。在东京大学时，与高崎直道教授讨论甚多，高崎君非常慷慨地将其研究心得和盘相赠。长尾雅人教授计划积十年之功翻译《摄大乘论》，目前正翻到此书的前二章，他也拨冗数度批阅此书文稿，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服部正明教授有关瑜伽行派的著作是我见过对瑜伽行派最为明晰的阐述，我在京都大学逗留期间承蒙他通篇细阅了我的书稿。

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其他很多同事——梶山雄一、Lewis Lancaster、Al Dien、Douglas Daye、Julius Moravcsik、Whalen Lai、Alan Sponberg、袴谷宪昭，及其他的很多、很多人——我还要感谢这么多年来对我的这项研究提供帮助、批评和支持的人。我要向 George Hart 致以最深的敬意，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梵文导师，感谢他一次又一次地和我一起研读梵文，还要感谢他帮我打开了电脑时代的大门。他是我最为特别的朋友和同事，和他一起工作永远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我能如期完成此项研究，要归功于我的研究助手 Graeme Johnson、Kenneth Tanaka 和 Elizabeth Kenney。尤其是 Elizabeth Kenney 耗费了不少时间去阅读本书的多个文稿。Gigi Wang 和 Jon Atkin 是我在电脑方面的助手，他们对电脑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减轻了我准备此书的难度。我的编辑 Shirley Taylor 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态度使本书最终得以定稿。

这项工作的雏形曾在《印度哲学》、《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会刊》和《东方与西方



哲学》等刊物上发表。在此我向上述刊物表示感谢,还要感谢《东方与西方哲学》的出版者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将已于该刊发表的工作并入本书。

美国国家基金翻译项目资助了我在 1977 年夏天,以及 1981 至 1982 学年假期期间的研究。我尤其要感谢翻译项目的主任 Susan A. Mango 的协助。斯坦福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到日本游学的机会,并且在本研究的最后阶段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系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经费,人类与科学学院院长办公室则提供了电脑方面的相关经费。没有上述的慷慨资助,本书的出版将是绝难想像的。

蒂安娜·保尔

前 言

公元6世纪,佛教在其创生地印度已传逾千年,传入中国也已六百余年。中国南北各地,举凡文人思想、机构制度和艺术形式,无不见佛教的影响渗透。大量以印度或中亚文字写就的佛教典籍被转译成中文,中国佛教正以注解经论的方式形成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独特诠释。当真谛以传法僧的身份于公元546年抵达中国时,中国南方正沉浸在有关佛性和人如何成佛的各种理论之中,并且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宗派:三论宗(Mādhyamika)、涅槃宗(Nirvāṇa)和以阿毗达磨教义为核心的成实宗(Satya-siddhi)。然而,来自印度的佛教经论在当时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中国信众在佛教义学上亦罕有创见。

在众多将佛法传至中国的译经家中,真谛被目为6世纪超群卓著者,与公元5世纪中国北方的高僧鸠摩罗什,以及之后公元7世纪的玄奘并驾齐驱。然而,与这两位译经大师不同,真谛未曾享有皇室的供养,而那将是可能使他得以安安稳稳翻译自己携至中国之大量典籍的重要保障。尽管如此,就所处环境而论,真谛依然成功地转译了一批佛教经典中最为艰深的著作。

外来的哲学观念激发了中国人的想像力,使其发展出与中国文化相融的伟大的佛教哲学体系,而真谛正是将此等观念引入中国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为隋唐时期鼎盛的佛教宗派——华严、天台、法相和禅——在教义上的创造性探索开辟了道路。天台和华严就是在真谛译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还对真谛开创的摄论宗做出了回应。此二宗的法主(天台宗智顓和华严宗法藏)都曾深入研究过真谛的主要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他们创造出与真谛所传思想相应的系统而又独特的中国宗法。禅宗在唐朝时试图革新佛教,也同样是以真谛的译著作为依据。

玄奘,这位光芒几至遮蔽真谛的大师,无疑也深受真谛的影响,并且还曾受教于真谛的几位弟子门下。为了考量真谛译文的准确程度,他不得不只身前往印度求取梵文原典。在对真谛译文进行评判,并对诸多此类瑜伽行派文献进行



重译的基础上，玄奘创立了法相宗，即唐代的瑜伽行派。

这些伟大的汉传佛教宗派不再仅求仿效和趋近印度的佛教思想。在隋唐时期，他们秉承汉地佛教思想家的著述，跻身于优秀的思想家之列。法相宗得益于真谛对瑜伽行派重要教义的传译，而其他宗派的作品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真谛开拓性译著的影响。

那些为真谛赢得译经大师声名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属于瑜伽行派。其中为汉传佛教传统所重之最著名者，当数他对四世纪印度两位伟大的瑜伽行学者——无著、世亲两兄弟作品的转译，其中包括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颂》和《唯识三十颂》，无著的《摄大乘论》以及《瑜伽师地论》的一部分。此外，真谛进行的一项最复杂、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他对世亲《摄大乘论释》的翻译，这部作品乃是世亲对无著瑜伽行教理纲要所作的评释。也正是这部作品为摄论宗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无著、世亲的主要论著经过系统化后，成为印度佛教宗派中为人所知的瑜伽行派(Yogācāra)或称唯识学派(Vijñānavāda)。他们的作品是对空义的阐释，这是所有大乘佛教理论的核心教义，空者即否认一切现象的自存性或实体性。据此则无物能依其自性或自力而独立存在，亦无物可以具有不变的属性。在承袭空这一核心教义的同时，瑜伽行派或唯识学派更广泛地探究了主体的性质问题，即探究诱使感知者认为确有自存实体存在的心理过程的结构。对瑜伽行派或唯识学派而言，称诸法皆空(Empty)即意味着诸法皆为心识所造——一切发生于我们视为实体之上的相互作用皆不过是心之所现。心(Mind)及其世界是一个纯粹由心识运作的闭合系统。存在的不过是自意识演生出来的图像和符号，而我们却将这些演生物误作一个包含众多物体的外部世界。心的造物本身就是信号，提示我们意识正在起作用，而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本质上是由我们自心所造的图像组成。意识演生出多种形式，这些形式貌似客观事物，实则仍是意识的形式：一念催生者仍是一念，而非外在事物。由此，事物不过是被假想为具有实体性的观念罢了。意识呈现出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多元形式。不过，意识不应被解释为各种静态的形式，而应被解释为经验显现其中的流转过程的不同状态。这些状态相互作用，且没有任何一种状态是绝对的或终极的。整个过程按逻辑的顺序而非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来加以描述。每一种状态都涉及一连串感觉信



息的产生,我们又从这些信息中构建出所谓的客观世界。“此学派唯一承认的实在(reality)乃是思想的实在。所谓思想,不是指思想的客观内容,也不是指主观的思想者,而仅仅是思想本身。”^①换句话说,知觉(perception)并非是一外在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与某一名称、概念或认识论对象之间进行的关联活动,而只不过是心的活动或是心识的流转过程。

当瑜伽行派的典籍于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初次传入中国时,时人一定切实感受到了其文本翻译之难。有着法护(Dharmarakṣa, 385—433)和求那跋摩(Guṇavarman, 367—431)两个译本的《菩萨地经》,显然是这些典籍中首部被译成中文者。求那跋陀罗(Guṇabhadra, 394—460)不仅翻译了瑜伽行派的典籍,还翻译了如来藏学的经典,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胜鬘经》、《楞伽经》和《解深密经》。在南北朝时期,借北魏菩提流支(Bodhiruci)、勒那摩提(Ratnamani)和佛寂(Buddhaśānti)之力,瑜伽行派典籍的传译速度得以大大提升,其中佛寂翻译了《十地经》、《宝性论》(一部如来藏学的经典)以及《摄大乘论》。随着文本翻译的推进,世亲和无著的作品被更广泛地引介进来。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合译了《十地经》,其中出现的阿梨耶识(ālayavijñāna)理论开始影响中国佛教,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所有感官经验会在潜意识状态下含藏于阿梨耶识中。至真谛抵达中国之际,已有南北地论两种瑜伽行派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

除了传译瑜伽行派的典籍,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传法僧也致力于翻译如来藏学的经典,如来藏思想亦为印度佛教思想中重要的一系。求那跋陀罗已经译出了《胜鬘经》,勒那摩提翻译了《宝性论》,后者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胜鬘经》,而且在专门讨论如来藏思想的经论中,它是目前仅存有梵文本者。由于上述大师同时兼译如来藏和瑜伽行派的典籍,所以在吸收这些译著的中国读者心中这两种思想逐渐被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将如来藏和瑜伽行理论联系起来的倾向,也出现在真谛对经典所做的某些诠释当中。此外,那些在真谛译著基础上演绎发展起来的隋唐佛教宗派,也很注重这两种思想体系的融合。从教义上来看,如来藏学的核心信念是一切有情众生皆有觉悟成佛之质。初发心被形象地比作胎儿或种子,能在其自身的子宫之中发展、成熟,直至成佛。而觉心,即“自性清净心”,

^① O'Brien, "A Chapter on Reality from the *Madhyāntavibhāgaśāstra*", 283 页。



则是坚不可破的。如来藏理论重新阐释了空义，给空这一概念赋予了积极的属性。在印度的著述中，瑜伽行与如来藏思想的综合，往往混合了对如来藏思想中的无垢清净心更为虔诚的信仰，以及对瑜伽行派阐释的心理过程更为哲学化的分析。由于两种教义自印度即有了义理上的融合，并且从在汉地传播之始就有了历史上的联系，所以真谛的思想，尤其是他的阿摩罗识或曰“净识”这一观念，也常常被看做是瑜伽行与如来藏思想的某种融合。其中，真谛对阿摩罗识清净性的关注与如来藏思想相应，而对以阿摩罗识作为终点的心理过程的哲学分析则借自瑜伽行派。后继的隋唐佛教各宗派无疑都依据如来藏学说对真谛的大部分著作进行了诠释，因而这些宗派自身的发展，本身也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融合。

在揭示真谛瑜伽行思想纲要的《转识论》中，有许多关于最具特色的瑜伽行派教义的讨论。不仅如此，这部短小的作品还包含了对阿摩罗识这一真谛重要的教义发明的阐释，而真谛其他篇幅更大的作品则对此付之阙如。《转识论》是对世亲《唯识三十颂》的翻译，同时夹有真谛的大段评释。《唯识三十颂》形式简要地说明了瑜伽行派的基本教义，相当于阐释瑜伽行派哲学基础的一个精炼的纲要。因此，对于理解由世亲塑造、真谛诠释的瑜伽行派最核心的教义而言，《转识论》可谓至关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对于阐释真谛自身的思想，还是就论证印度和中国瑜伽行派的本质差别而言，《转识论》都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不仅如此，《转识论》还昭示了后继的中国佛教宗派的某些思想倾向。

《转识论》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不像真谛的其他一些译作那样仅为残篇。作为一部纲要，它指示了通向真谛所传思想体系的门径。与此同时，它提出了大量复杂的论证，却又并不显得琐碎和纷乱（可与《摄大乘论》相较）。《转识论》提出了对认知功能的一种“系统化”的解读，即一连串强化某种行为和观念模式的刺激—反应图式。这种心灵观使得该论不仅在从事亚洲研究的人文学者看来极富魅力，而且对那些从事比较哲学和心理研究的学者来说也颇可玩味。《转识论》中展现的意识流过程假设了一个潜意识“清算所”（阿梨耶识）的存在，它以某种有点类似电脑的运作方式储存、整理和编制心理状态。瑜伽行派的佛教学者与今天的许多认知心理学家一样，有着远大的抱负和雄心壮志：试图将诸如语言、记忆过程、知觉、推理和情感之类的众多认知功能，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展



现出来。在真谛所诠释的作品中,关于心的分析说明了知觉以及概念的形成何以有众多模式的原因。他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心灵哲学,即从最基本的意识层面一步一步地向语义话语层面的分析推进,并与瑜伽行派的教义保持一致。在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看来,瑜伽佛教的新颖之处即在于其论题所具有的心理基础:语言引发心理态势和情感;情感扭曲知觉;冥想不仅是一种修行实践,也是疗救扭曲之途,对于整个体系的合理性至为关键。

尽管真谛的各个作品在思想上并不一致,但他至少将瑜伽行看作这样一个体系,其中,我们经验到的世界乃是从不断运转的认知行为中演生出来,除此之外别无世界可被我们经验到(*experience*)(这与声称别无世界存在(*exist*)是两回事)。

真谛是一位丰产的译者和论者,他显然在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就已引发了争议,这导致他的一些作品颇为突然地消失了,而另一些作品则被割裂成片段。同时,也很可能有一些归于真谛名下的作品乃是伪托,而并非出自他的译笔。在我翻译真谛作品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好在有《唯识三十颂》和安慧评释的梵文原本可资比对,这些困难才稍有所减。此外,有《成唯识论》中所含同题为《唯识三十颂》的玄奘译本存世,也为理解玄奘和真谛所释世亲思想的主要差异提供了宝贵信息。

学界关于真谛的研究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步入巅峰,关于真谛和瑜伽行派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出自法国和日本。许多瑜伽行派典籍的翻译,如梵文本的《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以及玄奘校译的《摄大乘论》均完成于这一时期。然而,对真谛的关注仍未上升到应有的高度,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他对汉传佛教独创性的贡献,而更多地讨论了他对梵文本的翻译问题。当然,与印度的佛教传统进行比较,对发现汉译本的增、异之处也很重要,但真谛的重要贡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将瑜伽行派传至中国。《转识论》是《唯识三十颂》最早的汉译本,从而体现了这种印度的心识哲学被介绍给中国的知识阶层时的最初状态。

本研究首先讨论了真谛的标准传记以及僧传的要素,接着展示了真谛时代印度和中国南方的历史、政治背景的总体状况。当时,中国正逢乱世,真谛一面呕心沥血于其哲学和宗教伟业,一面不得不经常面对政治上的劫难,正是这样的环境导致其某些作品前后不一,并有部分作品散为片段。第二章继续以真谛的



工作为主题,一方面表明他的那些重要弟子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一方面提出了存在于南、北地论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教义争端。

接下来的两章,主要介绍真谛对瑜伽行派关于语言和认知过程的观点所做的哲学阐释,此二者正是瑜伽行派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文中将对意识结构加以描述,并对关键的论证部分进行意译。

第五章会将《转识论》置于一个更大的文本脉络中进行讨论,《转识论》无疑曾是此文本的其中一部分。在对该文本进行分析时,会以玄奘译本和梵文原本作为例证,以阐明真谛对汉传佛教的贡献及其原创特性。第五章后附有本人对《转识论》的英译。附录一是关于真谛生平主要活动的年表,附录二是归于真谛名下的作品列表。附录三是地论和摄论两宗主要弟子的世系图。本书的注释,尤其是那些有关《转识论》英译问题的注释,涉及了佛教学上的专门讨论。

目 录

总序	觉醒	1
致谢	蒂安娜·保尔	1
前言		1
第一章 真谛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1
印度和扶南		3
梁末陈初之际的中国南方		6
真谛		10
第二章 真谛思想的传播		26
真谛的弟子和法嗣		27
地论和摄论思想		34
第三章 瑜伽行派的语言理论		57
语言和真的关系		59
真谛对瑜伽行派心识内在结构的看法		69
瑜伽行派对语言哲学的贡献		76
结语与评述		77
第四章 心识哲学		79
文本资料		80
识的结构		83
唯识		87
心的造作与虚妄分别		88
相互依存与自我意识		91
绝对与唯识		93



阿梨耶识的空性	97
第五章 析《转识论》.....	102
文本概览.....	110
《转识论》与玄奘《成唯识论》的主要区别.....	119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29
附:《转识论》译文	141
附录.....	149
一、真谛生平年表	149
二、真谛的主要作品	153
三、摄论和地论的传承谱系	157
参考资料.....	158
一、缩写	158
二、参考书目	159
三、汉文对照表	168
译后记.....	173

第一章 真谛的生平和所处时代

在宗教传记或圣徒传中，传记材料的选取对于宗教人格的突显，所起作用尤为关键。^①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高僧传》，从很多方面将僧人们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事迹结合起来，书中既写了僧人们一如普通人的情感、抱负和弱点，也记录了他们之所以堪称高僧的种种独特修行及精神修为。换言之，《高僧传》及其后继的《续高僧传》，都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那些被中国佛教徒视为宗教典范的僧侣们的生平事迹。^②《续高僧传》里的《真谛传》就在公元6世纪那种人心异变、政治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描绘出了一个虔敬的学者形象。

那时正当中国南北朝晚期，随着受南北朝各朝廷资助的印度传法僧人大批来华，各种佛教学派涌现并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佛教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译经师对经文诠释的影响下成形的。自然，王权稳定的太平之世所出译经与天下动荡的乱世所出译经相比，译经数量和学术水准都远为殊胜，因而也流布得更广。通常，最为重要的译经和解经都是在那些深受佛教影响的朝廷官员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实际上，说当时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方向在很多方面都是受那些来自印度和中亚的主要译经师的翻译所影响，也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当然，中国的佛教“宗派”并不是有着组织分明的等级制度和绝对权威的教条典章的教育机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教育，人们的任何努力能否历劫而存都与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和地理经济条件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南北朝晚

① Reynolds 与 Capps 编辑, *The Biographical Process*, 第3页。

② 《高僧传》和《续高僧传》，分别见于 T. 2059. 50 和 T. 2060. 50。《高僧传》由梁朝慧皎(497—554)约于公元530年编撰而成，记录了公元67至519年间，大约257名高僧以及他们的243名侍者或弟子的传记。这部僧传成为此后续出的所有僧传的典范。《续高僧传》，即《高僧传》直接的后继者，由唐代道宣(596—667)约于645年编撰而成，记录了公元520至641年间，340名高僧以及他们的60名侍者的传记。《真谛传》就包含在《续高僧传》中。